

Costica Brăilătan

# 生死之间

哲学家实践理念的故事



# Dying for Ideas

The Dangerous Lives of the Philosophers

〔美〕科斯提卡·布拉达坦——著

吴伟伟——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 生死之间

哲学家实践理念的故事

Dying for Ideas  
The Dangerous Lives of the Philosophers

〔美〕科斯提卡·布拉达坦——著

吴万伟——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死之间：哲学家实践理念的故事 / ( 美 ) 科斯提卡 · 布拉达坦著；吴万伟译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8.11  
书名原文： Dying for Ideas: The Dangerous Lives of the Philosophers  
ISBN 978-7-5117-3499-0

- I. ①生…
- II. ①科… ②吴…
- III. ①哲学史－西方国家
- IV. ① 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07115 号

DYING FOR IDEAS: THE DANGEROUS LIVES OF THE PHILOSOPHERS  
by COSTICA BRADATAN

Copyright: © Costica Bradavan, 2014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8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 生死之间：哲学家实践理念的故事

出版人：葛海彦

出版统筹：贾宇琰

责任编辑：霍星辰

责任印制：刘慧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33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传 真：(010) 6651583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223 千字

印 张：9.375

版 次：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9.00 元

网 址：[www.cctphome.com](http://www.cctphome.com) 邮 箱：[cctp@cctphome.com](mailto: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5626985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55626985

谨以此书献给  
妻子克里斯蒂娜和女儿安娜斯塔西  
( *Cristinei și Anastasiei* )

*Continuamente moriamo, io mentre scrivo queste cose; tu mentre leggerai, ambedue moriamo, tutti moriamo, sempre moriamo.*

(Francesco Petrarca)

不断走向死亡，我在写你在读这些话时，两人都在走向死亡，我们都要死，永远地死去。

——弗朗西斯克·彼特拉克

## 致 谢

在概念阐释和酝酿时，书籍或许需要独处，但在本质上，书从来都不孤独。其实，在很重要的意义上，书籍不过是与他人相处的另外一种方式而已。写书更是如此：写书就是向他人学习，与他人交谈，赢得他们的支持，领受他们的恩惠。读者诸君即将阅读的本书也不例外。

作者确实心怀感激。首先感谢布鲁姆斯伯里出版公司的编辑丽莎·汤姆森对该书难以置信的信心和坚定的支持以及在整个过程中明智的建议。感谢文字编辑们耐心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感谢约翰·卡鲁阿纳、安德烈·科德斯库、大卫·库柏和罗伯特·辛纳布林克阅读了整部书稿，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这些慷慨无私的朋友在改善本书质量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实在让人感激不尽。笔者还要感谢多年的老朋友奥列林·克拉伊图，他与笔者详细地谈论了该书的进展；里鲁是本书成型的耳闻见证人。感谢斯蒂芬·克拉克、西蒙·克里奇利、葛瑞汉·哈曼、朱塞佩·玛佐塔、詹姆斯·米勒、乔纳森·门罗、罗伯特·尼克松、英格丽德·罗兰和迈克尔·沃尔泽在很早但很关键的时候支持该项目。感谢鲁斯·阿比、丹尼·奥巴克、米哈伊·伯塔、米歇尔·伯罗斯沃克、拉谢尔·布雷纳、彼得·切尼、赵淑、普莱提·查普拉、霍华德·库尔茨、斯蒂文·德鲁尔、克劳迪娅·戈提耶、萨布里纳·菲里、丹尼尔·基夫

兰、大卫·戈德斯坦、亚历山大·冈格夫、格雷格·海格、劳拉·哈里森、彼得·哈里森、加布里拉·霍夫斯·德拉尼、维托里奥·豪塞尔、伊恩·兰诺西、马修·兰姆、迈克尔·马德、玛利亚·里布兰迪·罗查、戈登·玛丽诺、尼克·奈斯比特、大卫·莱奇奥、罗布·尼克松、马克·罗彻、克劳迪娅·萨多斯基·史密斯、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多林·托多兰、克里斯托弗·威廉姆斯、吴万伟、凯瑟琳·扎科特、迈克尔·扎科特的关心、鼓励和建议。还要感谢很多其他人，因为太多，无法在此一一列举，他们都在该项目的酝酿和实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时候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些。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笔者一直非常幸运地获得了美国及海外的若干岗位津贴奖学金。笔者非常荣幸地成为下面这些研究机构的研究员，在此谨表谢意。它们是：纽伯瑞图书馆（芝加哥）、威廉·安德·鲁克拉克纪念图书馆和 17—18 世纪研究中心（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文研究所（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华盛顿特区）、圣母高级研究中心（圣母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纽约博格利斯科基金会、利古里亚人文艺术研究中心（意大利热那亚）、格莱斯顿图书馆（英国）。为了完成本书，笔者还获得了德克萨斯理工大学的研究资助（教务处、主抓科研的副校长和荣誉学院）以及埃尔哈特基金会的资助。如果没有这些机构的支持，本书的写作将会非常困难。过去几年里，本书的部分内容曾经作为学术会议论文或以讲座的形式在北美、南美、欧洲、亚洲和澳大利亚等的大学里发表过。在这些地方，来自同行和公众的反馈意见都非常重要。笔者还将本书的某些片段融入到柏林欧洲人文艺术学院（ECLA）若干暑期的系列讲座之中。2010 年笔者在印度讲授了名为“生死问题”的暑期研究

生讲座。该项目是由印度普纳大学英语系主办的，由巴罗达市当代理论论坛组织。笔者在普纳大学做的讲座的大部分成为本书的组成部分。笔者非常感谢中心主任普拉富拉·卡尔博士的授课邀请，感谢上这门课的学生，他们是老师梦寐以求的最好学生。2014年2月，《生死之间》的书稿在孟买印度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组织的研讨会上得到热烈讨论。笔者非常感激这次研讨会的参加者。特别感谢兰简·卡马尔·潘达博士组织这次会议和对本书的评论。感谢迪帕·米世拉博士和普拉维什·荣格莱博士的精彩反馈意见。

就在从事该项目的过程中，笔者还发表了若干论文谈及本书主题的众多方面。这些文章或多或少地被重新修改、重组（有时候已经到了认不出来的地步），纳入到本书最后的定稿中：“作为死亡艺术的哲学”（《欧洲遗产》）；“未来之光：濒临死亡的身体的政治用途”（《异议者》）；“自焚的政治心理学”（《纽约政治家》）；“作为生活艺术的哲学”（《洛杉矶书评》）；“从初稿到确定的作品：现代性初期的死亡、孤独和自我创造”（《文化、理论和批评》）。为此，笔者非常感谢这些期刊。

# *Contents* 目 录

致谢	01
绪论	001
1 作为自我塑造的哲学	013
2 第一层	047
3 身体哲学	107
4 第二层	157
5 殉道者哲学家的成功之道	201
后记：笑着去死	248
参考文献	253
译名对照表	266
译后记	276

# 绪 论

死亡是人类获得的最宝贵财富。难怪最大的不敬就是滥用死亡，不恰当地死去。

西蒙娜·薇依

## 生死问题

苏格拉底从来没有写过一行字，但他的死是一部杰作，并使其名垂青史。捷克学生扬·帕拉赫活在人世时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在 1969 年 1 月以自焚抗议别国入侵自己的国家之后，他在许多人看来简直已经成了半个神，成为拥有惊人活力和影响力的人物。他从坟墓中影响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每当甘地又一次开始“绝食至死”时，印度的一切都变得异常充满活力，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活跃。在他绝食期间，“甘地身体状况的每个变化都会播放到国家的每个角落”。( Fisher 1983: 318 ) 整个印度都生活在甘地的饥饿之中。

死亡似乎并不总是意味着对生命的否定——有时候它具有改善生命矛盾潜力和强化生命的力量，以至于到了为生命赋予新活力的程度。死

亡的呈现能够给生者身上注入一种对存在的新认识——的确是对存在的更深刻的理解。因此，公平地说，生命需要死亡的说法并非毫无道理。如果没有死亡，生命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首先，出于自我实现的理由，生命需要死亡。通常，只有在我们失去某物或者即将要失去它的时候，我们才会认识到它的宝贵；正是其突然离开的前景教导我们如何欣赏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死亡能够通过其紧密性为生命行为带来新强度。历史学家已经注意到一个令人好奇的事实：每当造成重大伤亡的自然灾害或社会灾难——如瘟疫或毁灭性的战争——来临之时，人们似乎常常更愿意热衷于世俗的享乐。他们常常带着新发现的激情贪婪地追求肉体快感（吃、喝、性）。在危机时刻，常识要求我们谨慎地行动以便保存资源。事实上他们并不这样做，相反，他们很快地挥霍掉所剩无几的任何东西。因为他们处于最匆忙的奔波中，就在死亡逼近他们时，这些人迫不及待地陶醉和沉溺于生命的快感中。恰恰是死亡的存在增加了他们对生的渴望。这种态度似乎缺乏理性，但其中却蕴含着某种神奇的东西。在被毁灭的边缘，这些人发现了存在的奇迹，因而要大肆庆贺一番。

意大利诗人乔万尼·薄伽丘的《十日谈》让我们瞥见这个独特的背景，虽然可能有些模糊。1348年黑死病在佛罗伦萨猖獗泛滥之时，一群年轻人躲藏在离这个城市几英里远的别墅里，开始了10天充满激情的生活，讲述栩栩如生的淫荡故事。其结果是产生了一本有着100多篇赞美生命和最充满肉欲的“生命之喜悦”的故事集。薄伽丘凭直觉发现了死亡恐惧与欲望之间的深刻联系：在极限场景中，接近死亡可能成为最强大的壮阳药。或许受到乔治·巴岱尔（Bataile 1986）的启发，法国历史学家菲力浦·阿利埃斯谈到死亡的某种“性欲化”倾向。就像性

行为一样，死亡也被看作“一种将人从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的偏离错乱，目的是让他经历突发事件，一下子投入到非理性的、狂暴的、美好的世界”。(Ariès 1974: 57)

在所有这些可能的自愿死亡中，读者诸君开始阅读的本书主要讲述为哲学而死的哲学家们的故事。这种死亡当然不无反讽的意味：你付出了所拥有的最宝贵东西（你的生命）的代价以便得到通常被认为最没有意义的行为。但是哲学家们——尤其是那些最具魅力的哲学家们——若无反讽的意义就什么也不是了。在某种意义上，《生死之间》是一种未经探测的本体论——反讽式存在的本体论练习。

## 必然死亡

公元前 399 年，苏格拉底被雅典法院判处死刑后饮毒酒而死。他被指控亵渎神灵、腐化青年。在审判中，苏格拉底明确指出，无论结果如何，他都不会改变他理解人生的方式，也不会改变他的哲学实践。在审判之后和处决之前，苏格拉底仍然有机会在有钱朋友的帮助下逃命，但出于对城邦法律的忠诚，他拒绝逃亡。

公元 415 年，来自亚历山大的异教徒女哲学家希帕提娅（古希腊女哲学家）被一群基督教暴徒残忍地杀害，这显然受到该城长老西里尔的怂恿。因为就在这一年，希帕提娅已经成为独特的思想家，也是该城影响力最大的老师。甚至城市的管理者欧列斯特斯也积极与其交往，向她请教，虽然他是个基督徒。显然，西里尔对希帕提娅在该市和欧列斯特斯圈子里的巨大影响力感到不快。

1535 年，托马斯·莫尔爵士因为被控犯下“叛国罪”而在伦敦塔

被枭首示众。莫尔的叛国罪源于他拒绝宣誓忠诚于《王位继承法》(王位要传给未来的伊丽莎白一世，她是亨利八世和新婚妻子安妮·博林还未出生的孩子)，而且拒绝承认国王在宗教问题上的最高权威。莫尔认为国王只是普通人，因而不可能成为教会首脑，“凡人不可能成为精神领袖”。

1600 年，乔尔丹诺·布鲁诺在被天主教会神圣罗马教廷判处死刑之后在罗马火刑柱上活活烧死。他已经 在宗教裁判所的监狱里服刑 8 年。作为多明我会的修道士，布鲁诺被控在诸如圣餐变体论、三位一体、基督成圣和复活、圣母玛利亚的贞洁等问题上持有违背教会正统思想的信念，即使在走向火刑柱的路上，他也顽固地拒绝忏悔。

1977 年，捷克现象学家雅恩·帕托什卡（胡塞尔的嫡传弟子）在经历捷克斯洛伐克秘密警察 11 个小时的审讯之后，在布拉格医院死于脑中风。帕托什卡之所以被调查是因为他在发起人权运动（《七七宪章》）中所发挥的作用，该运动被当局视为图谋颠覆政权。帕托什卡觉得为了忠诚于自己的哲学理念，他必须投身于这样的公民运动中。



## 哲学是危险的追求

一个人要成为什么样的哲学家，才能为理念而死？首先，这些人虽然具体信仰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下面这个观念的坚定承诺，即哲学首先是你践行的某种东西。当然，哲学涉及思考与写作，阅读与交谈，但这些都不应该被视为目的本身；这些活动需要服务于哲学的最终目的：自我实现。所以，你的哲学不是储存在你书本中的东西，而是你随身携带并体现出来的内容。它不是你谈论的“话题”，而是你

的人生体现。此种观念就是作为生活方式或生活艺术的哲学。

矛盾的是，作为生活艺术的哲学常常最终归结为学习如何死亡，即死亡的艺术。最好的例子是苏格拉底本人。他把哲学理解为生活方式，并毫不妥协地践行他的哲学，并最终导致其死亡。他的弟子柏拉图深受雅典人对待其老师的方式的刺激，竟然在据说是苏格拉底被处决前最后几个小时的对话记录《斐多篇》中，娴熟地提出了他对哲学的认识，即哲学不是任何别的东西而是准备死亡。从时间顺序来看，《斐多篇》属于柏拉图的“中年时期”之作，肯定是在老师死后很多年才写成的。把这视为“哲学正义”的行为非常具有诱惑力：柏拉图这个仍然陷入悲伤之中还没有恢复过来而且可能仍然愤愤不平的人，把老师之死这个毁灭性事件私自纳入到他对哲学的定义中。无论是不是“哲学正义”，柏拉图的观念都表达了一个关键的见解：哲学只有在为我们提供死亡艺术的情况下才是生活艺术。

柏拉图的定义直到今天仍然引起回响。在 16 世纪，蒙田呼应西塞罗的说法，将他的一篇文章命名为“哲学思考就是学会如何死亡”。到了 20 世纪，西蒙娜·薇依把死亡置于其哲学探索的核心。在她看来，学会如何死亡甚至比学会如何生活更加重要。薇依说，因为死亡是“人能够得到的最宝贵财富”，“最大的不敬是滥用死亡”。(Weil 1997: 137) 如果我们浪费死亡，我们的人生将变得毫无意义。本书就是谈论哲学家是如何“很好地使用”死亡以及他在此过程中是如何重新标识自己的人生并使其作品变成一个整体的。

哲学作为生活艺术的观念在当今主流哲学界并不时髦，虽然它并不缺乏吸引力。实际上，假设言行之间、思想与行动之间存在着完美平衡的哲学定义，一直包含一种令人满意的东西。哲学是一种自我实现，即

哲学家的自我是“不断取得进步的工程”，是他通过哲学思辨而创造出来的东西。但与此同时，这个观点很危险，因为它可能令那些较真的人陷入麻烦之中。从社会的角度看，投身于生活艺术哲学的哲学家常常是有话直说的激进分子，对其工作的部分描述就是不要让他闭嘴。但是，说真话的践行者很少能生活幸福。

其实，拥抱哲学是自我改造实践的观念就会使你自己变得极其脆弱。如果哲学的真诚性体现在践行这个思想的人身上，那么哲学家简直就是没有安全网的走钢丝表演者。哲学家的生活永远需要保持平衡：哪怕走错微小的一步，无论是偏向这边还是那边，都可能造成致命后果。如果他以与自己的哲学脱节为代价迎合世人的要求，那他就完蛋了；如果他遵循良心不惜牺牲个人安全，他也完蛋了。这恰恰是苏格拉底、希帕提娅、莫尔、布鲁诺和帕托什卡等人陷入的两难困境。在其人生的某个时刻，这些哲学家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忠诚于自己的哲学而死，要么背叛这种哲学而苟活。具体的细节或许不同，但情景的本质完全一样。他们中有些人或许被特别要求克制和忏悔，而其他人则有机会认识到，若不停止所做之事就将付出代价。哲学家的钢丝之行，其危险性也是如此。《生死之间》就诞生于他们对这种平衡术的痴迷。

要么忠诚于自己的哲学而死，要么背叛这种哲学而苟活，这种选择的意义无论怎么强调也不算过分。因为对这些思想家而言，哲学不仅仅是在原则上你能保持沉默或者将其抛弃的一堆教义，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弥漫在你整个人生中的东西。所以该选择承载着相当大的存在主义的分量。你不能像更换一件衣服那样轻松地改变你的哲学观点。因为哲学从定义上说体现在哲学家身上，放弃这种哲学就是把哲学家撕成碎片。面对这种选择的哲学家很快就会意识到，自己陷入的危机不仅仅

是与自己的观点在外表上保持一致的问题。选择还掩盖了一种考验：如果哲学不仅仅是空谈，它就需要经受住生活的考验。事后回顾起来，帕托什卡用毫不含糊的话描述了这个场景，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先见之明。他说：“哲学到了一个临界点，这时候仅仅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已经不够，虽然两者都有极大的威力；但在此刻，除非做出一个决定，否则哲学家将无法取得任何进步。”(Kriseová 1993: 108)接下来，我们需要用新的眼光来看待哲学：最终来说，哲学思辨不是关于思考、写作或说话的，甚至不是大胆的、勇敢的表演活动，而是其他东西——决心以身殉道。在本书中，笔者紧随这个决策过程的内在机制，在探究的同时描述哲学家以身殉道时身体所遭遇的变故。

这些哲学家的遭遇值得我们详细地回顾。有一天他们不知不觉地陷入令人担忧的新处境中。虽然是技艺高超的演说家，但他们现在意识到论证和辩论已经不起作用。这些擅长逻辑推理和说服他人的大师，如今落入话语和论证已经毫无用武之地的困境，无论其话语和论证是多么高超。此时，他们面对困境毫无招架之力，一生中唯一擅长的本事此刻没有了用武之地。这些思想家肯定或清晰或较模糊地认识到，如果不被彻底噤声的话，他们就需要比话语更强有力的方式表达自己。在紧张、严峻、直截了当的极限场景下，比话语更强大的就是他们的死亡了。他们只剩下濒临死亡的身体可用，将这个戏剧性场面用以表达依靠其擅长的修辞无法表达的内容。苏格拉底一生能言善辩，令听众心服口服，但他的死亡，说服力更强大。苏格拉底之死是他设计的最有效的劝说手段，以至于在多个世纪之后仍受到纪念，人们并不太清楚他活着的时候都做过些什么，但他的死亡方式人人皆知。

到了最终的考验时，哲学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必须放弃其常规做法

(演说、写作、讲课)而转向其他方式——表演,身体的表演,这非常说明问题。如此一来,我们就实现了一个完整的循环。哲学人生就意味着首先有身体的存在,哲学死亡同样如此。这些哲学家需要身体不仅是为了践行其哲学,更重要的是用身体来确认其哲学的合理性。笔者在《生死之间》中指出了哲学家将濒临死亡的身体作为思想的试验场,这是前所未有的尝试。

这些哲学家选择了一条把他们引入“优雅”之死的道路,这种死亡随后被塑造为其哲学著作的顶峰。无论这些思想家的著作质量如何,只要考虑到他们的结局,人们就会有一种认识,即如果我们将其与死亡割裂开来的话,对其著作的了解就不完整。事实上,这种死亡本身已经变成一部哲学著作,有时候甚至是其代表作。苏格拉底的死亡方式已经成为其哲学遗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很难想象苏格拉底寿终正寝、无疾而终的情景。此后,在死亡记忆开始困扰后代人时,这些哲学家的结局就拥有了越来越多层次的含义,直到最后他们变成了传奇人物。



## 哲学神话

幸运的是,哲学家很少因为宣扬的观点而遭杀害。因为一般来说,没有人把哲学家当回事。在大部分时间里,哲学家都是安全的,他们为有话直说的行为付出的代价小得可怜,就像被扎了一针那样微不足道。可是,他们的自愿死亡虽然罕见,却往往值得人们关注,因为一旦真的出现这种情形,这些死亡都会给后代带来巨大的影响。殉道者哲学家最终为后人留下漫长的阴影,使子孙后辈不由自主地感受到这些伟大死者的恩泽和震撼。人们对这些死者的记忆从来不会轻易消失,事实上随